

主編 李大綱
中國國家圖書館藏
民國西學要籍
漢譯文獻·倫理學

道德与辩证法

〔美〕杜威 等著 李书勋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伦理学

道德与辩证法

〔美〕杜威等著 李书勋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德与辩证法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伦理学)

ISBN 978-7-5520-1762-5

I. ①道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道德—关系—辩证法 IV. ①B82-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142号

道德与辩证法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 × 900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762-5/B.171

定价: 58.00 元 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一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，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，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主义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来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」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「活学活用」、「急用先学」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「西学」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「救国」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「天经地义」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「实用主义」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「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」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的情况来看，「民国西学」是一个比北大「启蒙西学」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「五四运动」及其启蒙大众的「西学」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「启蒙西学」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「民国西学」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「启蒙西学」纳入「民国西学」体系，「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」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「冲击」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「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」。反过来说，「翻译」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「会通」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「超胜」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「民国西学」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「美」杜威等著 李書勳譯

道德與辯證法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

譯者序

十六年前（民國十二年），中國發生過一次震動思想界的太論爭，即所謂科學與人生觀的就是。起因是張君勱先生在清華大學裏的一篇講演，他演說的大意是：人生觀不能受科學的支配，不能爲科學所解釋，因爲：『人生觀之特點所在，曰主觀的，曰直覺的，曰綜合的，曰自由意志的，曰單一性的……』接着他又舉例來說：『亞丹斯密，個人主義者也；馬克思，社會主義者也；叔本華，哈德門，悲觀主義者也；柏拉圖，黑智爾，樂觀主義者也。彼此各執一詞，而決無絕對之是與非。……』

演辭一出，中國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馬上起來應戰，在努力週刊上寫

下了幾萬字的長文；但主要的意思很簡單：科學是可以支配人生觀，解釋人生觀的。可是究竟怎樣支配，如何解釋，他卻完全沒有反舉出來；而更糟的則是丁先生拿了柏克萊，皮爾遜等的經驗批判論來反對張先生的柏格森主義，所以無怪陳獨秀先生在序文裏要說擁護科學這方面『幾乎是卸甲丟盔的大敗戰』了！

後來丁張兩方都參加了許多教授學者；但大半是像獨秀先生所說的：『下筆千言，離題萬里』，看了祇能叫人慨嘆乎學海的淵博，無從窺其邊際；至於究竟說些什麼，那恐怕連這班學者先生自己都不甚了了，所以那次論戰雖然是砲火連天，聲震遐邇，可是會幾何時，烟消灰滅，如今祇賸着亞東圖書館的兩冊小書，作個紀念，在現代人的腦海裏，可以說已經逝去得無影無蹤了。

我們現在如果重讀此書，在這些名流學者的煌煌大文中，誠如胡適之先生所云，祇有吳稚暉先生的宇宙觀與人生觀，才算稱得上『起講』，而值得胡先生『表示敬意』的。

因為參戰的全體學者中，就他們的專門學問說，雖然有許多是優秀的科學家，但是一談到哲學可就糟了，簡直是毫無例外地屬於唯心主義的營壘，擁護科學最力的胡適之與丁文江兩先生，也還只是從杜威先生那裏學來的一點實驗主義，所以無怪他們要在柏格森，杜里舒這班『玄學鬼』之前『卸甲丟盔』了。

不過吳稚暉先生這一通砲火，至多也只能破壞一部分『玄學鬼』的陣地，當然更談不到什麼『最後勝利』了。因為吳稚暉先生雖然採用了法國造唯物論的手榴彈，並且還開放了英國造進化論的步槍；但他總還不肯或不敢

用德國造辯證唯物論這一尊無堅不摧的大砲；所以他表面上似乎也打死過幾個『玄學』兵，但結果卻祇做了一個『科學』軍敗績後的一位『押陣大將』，等得到了民國十四五年，中國另一部分兵士搬出了馬克思那尊大砲來的時候，吳老先生索性就對『玄學鬼』投了降，把所有的武器都向真正的唯物論者投射過來了。這情形當時曾經使許多吳老先生的愛護者驚疑的，後來時過境遷，人們也就把這位『妙語驚天下』的老先生忘了；但是在哲學思想上，卻從不會有人企圖對他老先生的態度，作一次鄭重其事分析的。

在這篇短短的序文裏，我們當然不能來完成這個任務，不過既然把問題提出來了，總不能就此算數吧，至少我們得把吳稚暉先生思想的要點，加以簡單的觀察。他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，包含着以下的幾個要點：

『（一）我是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；』

『(二)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；』

『(三)……古人不及今人，今人又不及後人；』

『(六)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結晶，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；』

『(七)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。』

上面這幾點，一般的說來，當然都是唯物論的說法了，連辯證唯物論者都可承認的；那末爲什麼牠們不能戰勝『玄學鬼』，而且吳稚暉反被『玄學鬼』俘虜了去呢？原因很簡單：在階級社會裏談『人生觀的科學』，如果把階級的學說拋開不要，那就別談什麼反對玄學；因爲一個人既不能離社會而存在，則他無論如何，總不能不是社會中某一階級的一個成員，這一成員的資格，即確定了他的宇宙觀與人生觀（尤其是人生觀），現在假使想談某一人的人生觀而不從他所隸屬，所生活的階級立場上下手，只是空空地研究他

對於宇宙與人生的觀念，要想他不流於形而上的玄學，其可得乎？

誠然，吳先生把道德，直覺等『微妙的』東西，並不像『玄學鬼』那樣地統統送進了不可知的王國，他相信這些都是環境的產物，是受着空間與時間的限制的；但是撇開了階級來談社會環境，那末這所謂環境也就抽象與空洞得可憐了。同時『玄學鬼』也決不會怕這件武器的，而且他還能給你一個反攻；譬如吳稚暉說靳雲鵬聽了要『勃然大怒』的事情，假使你去對英國的勞愛喬治說，『彼亦止笑謝』，可知『羞惡之直覺，實會賦自環境……』但是『玄學』兵主帥張君勱先生也許會那樣來回答吳先生：我原已說過，『凡此問題，東西古今，意見極不一致』，所謂『東西古今』，就是所謂『時空的限制』了，你們只是重複了我的意見，並沒有進而說明『東西古今』的人生觀『不能一致』的道理。

如果張先生真的這樣反駁過來，我敢斷定吳先生是無辭以對的，因為所謂『賦自環境』也者，實在也只有說明其然，而不會說明其所以然呢。要說明其所以然，那只有借重那唯物史觀與階級學說了。靳雲鵬之所以聽見人家要『替他老母做媒』而『紅漲於臉』，以及勞愛喬治之所以祇是『笑謝』，歸根結蒂地說來，還是逃不了女子片面貞操與從一而終那些觀念的作用，靳老爺之勃然大怒，祇因為他是生長在前資本主義時代，他是宗法社會殘餘勢力的政治代表，是落後的地主階級的統治者；對於這個階層，女子的片面貞操觀是堅執着的；至於勞愛喬治則是世界最前進資本主義的產物，是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，對於這一階級，婦女的地位至少已經提高了，再醮婦已經算不得什麼恥辱了，所以他決不會因人勸喬治老太太再嫁而拚命；這樣看來，靳老爺的『怒』，與夫喬治先生的『笑』，實在不能簡單以中英國情殊